

为什么和美国人做生意比和中国人更简单?

洪培才



作者简介:洪培才 印尼社会活动家。印尼留华同学会主席、印尼工商总会高级顾问、上海印尼商会会长。

还记得我在10月12日写的一篇文章《下乡》?讲述一个刚认识的印尼侨胞,嫁给美国中部地区Indiana州Greensburg县的农民,邀请我去体验一下美国中西部大丰收的生活。我爬上了美国收割机,体验了收割大豆的乐趣。

在那短短的两天里,我把大豆上游到下游的产品工艺都参观了,体验了,长知识了。

其实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我还没有讲,就是帮当地的大豆,直接卖给市场,切断中间商,价格就更底。美国大豆出口有两个重要的市场,一个是中国还

有一个是印尼,这两个国家我当然十分熟悉,朋友也多。所以当小县的农民朋友和市长问我有没有渠道,我说可以试一试。

离开市长办公室,农民朋友陪我去参观养猪场,在车上我用微信发给中国上海与北京做粮食进出口的朋友,告诉他们我正在美国农场“打工”收割大豆,你们中国不是需要很多美国大豆吗?要不要直接买进Greensburg县农场的大豆。中国朋友们回复,什么国家政策,限购,疫情,要先考查,等等理由,弯弯曲曲的回复,意思是生意不好做也不想

努力去做。好吧,中国市场没门。

我再用免提电话打给印尼大老板,印尼每年进口三百万到四百万吨的大豆,主要是从美国和巴西进口。印尼朋友自己进口一百多万吨,占了印尼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一。他吃了一惊,问我怎么会跑去美国农场当“农民工”收割大豆。他还告诉我他公司目前有四位印尼采购经理正在美国中西部地区采购大豆和玉米。他会让公司市场部总裁和我联系。

晚上我们在美国农民家和印尼开了视频会议,两个小时,达成了协议,先购买10万吨大

豆试试。

一个月后,三位Greensburg农民已经抵达到雅加达,正式和印尼朋友谈判签长期协议。我也陪美国农民在雅加达吃饭,顺便宣传印尼美食文化。

就这么简单。

故事结束了?我自己认为结束了,一个月里从下乡自己收割大豆,到帮助农民直接卖产品给印尼市场,一切都那么顺利,感觉很好。冬天来了,我可以忙其它的事了。

可是今天在飞往纽约的新航SQ22航班,飞机飞越北极,我正在欣赏窗外绿色的北极光,

突然收到农民朋友的短信问候,说他们公司有佣金给我,每一吨多少钱,应该打到哪个账号?我吓了一跳,告诉他们没有考虑过什么回报。其实我十分感谢美国农民让我学会了开收割机也参加了劳动,也长了许多在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也帮了印尼朋友,也间接帮了印尼政府直接采购更便宜的大豆,有没有佣金一点也不重要。他们的诚意却让我感动。

现在我一直在深思,为什么美国会那么强大?是不是我们应该多学习他们简单的真诚的态度把事情做好?

椰風置雨

本报评论员:余凡

在国家反恐署(BNPT)及反恐特警(Densus 88)的严密监控和不懈侦查下,本国极端主义团伙的违法活动已受到很大的限制,牵涉到恐怖主义及颠覆国家宪法体制的组织成员被追踪抓捕;而数年前频发的自杀式爆炸事件已大幅缓和,让民众的生命安全得到保障。

但是,正如反恐特警首长马迪努斯(Marthinus Hukom)于今年3月21日在国会第三委员(Komisi III)闭门会议上的警告:“恐怖活动已呈下降趋势;但绝不能放松警惕!”

12月7日上午,万隆(Bandung)市民在网络上传一段视频,只见朗朗蓝天冒起一股白色的硝烟,网民说还听到类似爆炸的巨响,但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件。

《时代网》(TEMPO.CO)于12月7日报道,周三上午八点半,西瓜哇省万隆市的阿斯达那(Astana Anyar)警察分局操场发生了自杀式炸

万隆冒起恐爆炸弹的硝烟

弹袭击,消息马上震撼了各界民众。

西瓜哇省警察厅长(Kapolda)孙达纳(Suntana)警督随即宣布,在该炸弹袭击中,有11人受伤,其中10位警员,还有一名是恰好路过现场的平民。“受伤的警员梭比安(Sofyan)不久后殉职。”而携带自杀式炸药包的袭击者也被强烈的爆炸撕裂,横尸在现场。

警察厅长在现场附近向媒体介绍大约的情况,当时阿斯达那警察分局正例行早班的集结,袭击者强行闯入,并企图接近排列的警察队伍中,却被数名值班的警员所驱离。“但是他仍然试图闯闯,想靠近警员队伍,甚至拔出携来的利刃,接着就发生爆炸了!”

为了避免还有被埋置的炸弹,警方已经封锁了警分局现场附近的通道,做好安全保卫工作。孙达纳警察厅长呼吁:“请大家给予我们时间,警方将对现场进行详细和彻底的调查取证,包括袭击者及可能发现的指纹,以便确定自杀式爆炸

犯的身份及其他相关资料。”

《讲坛网》(TRIBUN-NEWS.COM)于7日称,阿斯达那警察分局爆炸发生不久,在WhatsApp社交平台就有消息传开,说当场毙命的恐怖袭击者叫AS,别名是AMW。他1988年8月24日出生于万隆市,居住在峇度农卡区(Batununggal)芝邦功(Cibangkong)村。他因参与极端组织于2017年3月被判4年牢狱,去年刚从Nusa Kambangan 牢房刑满出狱。

万隆市警察局长阿斯温(Aswin Sipayung)警官说明,警方正深入调查这起爆炸案,以警戒带封锁事发地点。“附近公路已被清场,我们在等省警察厅的炸弹专家前来勘查。”

国会第三委员会(Komisi III)民主党议员山多梭(Santoso)对爆炸案的发生表示遗憾。“这次发生自杀式爆炸,国家反恐署(BNPT)显然失职了。”他对记者说,接近圣诞节及新年,执法及情报部门应该提防恐怖袭

击。此外,BNPT对激进分子的工作做得不到位。山多梭认为,对恐怖分子的教育工作不要只以经费为导向,应该注重思想开导程序。

国内媒体8日称,BNPT副署长伊卜努(Ibnu Suhaendra)警督表明:“案犯AS在监禁期间,拒绝接受我们的‘反激进化’教育工作,完全排斥和我们见面交流的机会。”AS是被激进主义“彻底洗脑”的成员之一,获释后被列入必须密切监控的“红色名单”内。

警察总局(Polri)公关厅长拉玛丹(Ahmad Ramadhan)警督在万隆市警察局对记者说,AS携带的是“铁锅式”组装炸弹,闯入阿斯达那(Astana Anyar)警察分局时,其背包里有枚炸弹,胸前还带着一颗炸弹;当背后的炸弹被引爆时,胸前的炸弹被弹开,没有爆炸。

网红政论员艾科(Eko Kuntadhi)在CokroTV平台发表视频谈话,恐怖分子AS停靠在警察分局墙外的蓝色摩托车前面,挂着一张白纸板,

上面写着“KUHP、法律、多神论、异教徒,向撒旦法律的执行者宣战!”这绝非“独狼”行动,AS的后面还有组装炸药、设置方案及财务支持的团伙,而重要的是,还有那些以宗教名义灌输极端主义的“空想家”。他们把神圣的国家宪法当作“撒旦法律”,挑战多元化原则,严重威胁国家统一的基础。

艾科还援引BNPT的警告说,多年来,极端、激进、不宽容的哇哈比教派已在印尼蔓延,不断挑战“伊联”等开明教派的路线。其中,那位被新加坡政府拒绝入境的“长老”首当其冲,其追随者马上以本

末倒置的理由进行“掩饰”,但真相是不能被扭曲的!

印尼CNN网于12日报道,反恐特警周一上午10时许在万隆市冷功区(Lengkong)玛拉巴尔村(Malabar)一家民居突击搜查。冷功警分局局长依曼(Imam Zarkasih)证实:“的确有执行搜查,但还在深入调查。”据称,有37岁的某DY涉嫌与阿斯达那爆炸案有关,被搜的是某DY父亲的家,警方带走了装在几个纸盒内的证物,但是没有扣押或传讯任何人。

回顾中东地区多年来发生的恐暴和政变,政府应该该坚决斩断国内极端主义与国外激进组织的“黑金”通道及思想纽带,别让美丽的群岛,又再冒起“自杀式炸弹”的硝烟!



漫画 王锦松 (原载《联合早报》)



MARTINUS YOSEFUS MARWOTO HADI SOESASTRO KOLEKSI KELUARGA 陈岳明

马丁努斯·约瑟夫·马沃托·哈迪·苏萨斯特洛(Martinus Yosefus Marwoto Hadi Soesastro),生于1945年4月30日,原名陈岳明(Tan Yueh Ming),朋友们称他为哈迪(Hadi)。其父陈信玉(Tan Sien Giok),是一名记者,也是一名作家,经营一家名为“模范印刷”(Paragon Press)的著名出版印刷社。其母郭定兰(Kwee Ting Lan)。

在玛琅(Malang)的圣艾伯特天主教高中(Sekolah Menengah Atas Katolik,简称 SMAK Santo Albertus)完成学业后,哈迪(Hadi)前往西德亚琛(Aachen, Jerman Barat)的亚琛工业大学(Rheinisch-Westfaelische Technische Hochschule)学习。起初,他学习造船业(Teknik Perkapalan)。后来,在哈比比(B. J.Habibie)的劝说下(Hill dan Pangestu, 2010),他转向

跨领域经济学家哈迪·苏萨斯特洛

马克森修斯·德利·桑博多(MAXENSIUS TRI SAMBODO)

学习飞机制造业(Konstruksi Pesawat Terbang)。哈迪充分利用在德国的时间去学习、组织活动和工作。他曾担任西德印尼学生会(Perhimpunan Pelajar Indonesia Jerman Barat)主席。

在德国学生组织活动的参与,使其卷入印尼国内政治经济的流行思潮,即苏加诺统治时期反西方、反资本主义情绪不断高涨(Thee, 2003)。1966年,为弥补预算赤字,印尼政府无限制印钞,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印尼经济处于崩溃边缘。苏加诺统治时期政治经济的混乱和分子积极参与的精神,推动哈迪投身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经济学领域。

哈迪在印尼著名智库(Think Tank)-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简称CSIS)工作了大约40年。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成立源于留学海外的印尼大学生与国内活动家之间一系列讨论会。哈迪积极参与其中。1971年9月1日,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成立。同年,在德国完成学业后,哈迪加入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在推进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发展过程中,哈迪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

色。他担任过执行主任、研究主管、经济部门负责人等职务,也管理过英文期刊《印度尼西亚季刊》(The Indonesia Quarterly)。2008年,在他执行主任任期行将结束之际,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将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列为美国境外的世界30大智库之一(Hill dan Pangestu, 2010)。同时,《印度尼西亚季刊》(The Indonesia Quarterly)按国际期刊标准被列入斯高帕斯(Scopus)参考文献列表。

1978年5月,哈迪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兰德研究生院(RAND Graduate School,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Amerika Serikat)完成了博士学业,其博士论文是《印度尼西亚发展的外部资金的政策分析》(Policy Analysis for the External Finance of Indonesia's Development)。此后,哈迪便踏入学术界。国家建设规划局(Badan Perencanaan Pembangunan Nasional,简称Bappenas)汲取哈迪博士论文中的思想,并将其作为第3个五年发展计划(Repelita III, 1979年-1983年)文件的准备材料。(Hill dan Pangestu, 2010)

哈迪的思想中至少有三点值得赞赏。第一,哈迪重视能源领域,特别是农村能源。他曾是某个能

源项目的负责人并在1983年出版了一本相关研究的书,其名为《能源与广泛利用》(Energi dan Pemerataan)。到目前为止,能源的广泛利用仍是一个基本问题。哈迪强调,还有很大空间来提高农村地区燃料燃烧技术的效率,加强电力资源的使用以减少煤油消费十分重要。关于能源问题,哈迪在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分析》期刊(Jurnal Analisis CSIS)上发表了12篇文章。

第二,哈迪为印尼经济政策中的政治经济思想做出了贡献(Hill dan Pangestu, 2010)。学者和决策者们经常引用他的两篇文章,即1989年在《亚洲调查》期刊(Asian Survey)刊登的《印尼放宽管制的政治经济》(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regulation in Indonesia)和2005年在《2015年在东盟经济公报》(ASEAN Economic Bulletin)刊登的他和穆罕默德·查迪·巴斯里(Muhamad Chatib Basri)一起合写的《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经济贸易政策》(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Policy in Indonesia)。哈迪认为,如果技术专家可以降低政策中意识形态的敏感度,使之更加务实和简单,那么放宽管制将很容易实现;换言之,就是从高级政治到低级政治。哈迪

更看重在实现放宽管制中的每一步努力,也就是说“积小胜为大胜”。哈迪还进一步强调,印尼日益开放的经济要与政府企业角色转型经济相平衡,即要求经济模式从护者和被护者的关系的模式转向开放和建立相互负责的合作关系的模式。

第三,哈迪关于东盟与亚太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合作的思想。东南亚研究院(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简称ISEAS)是东南亚地区顶尖的研究机构,在它的图书馆可以搜寻到大约98篇哈迪的文章,有哈迪独撰的,也有和学术界其他同事一起合写的。主要以国际经济为主题,尤其是有关东盟和亚太地区的经济。如果称“他是东盟、东亚乃至全球有关国际经济一体化的顶级思想家和作家”也不为过。哈迪对于开放的区域主义原则的思想以及他对于东盟解决各种问题和挑战时态度不坚决或拖泥带水的做法的批评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Hill dan Pangestu, 2010)

哈迪承诺并致力于发展学术研究并构建国内国际学术研究网络,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在庆祝纪念印尼独立50周年之际,矿业与能源部(Kementerian

Pertambangan dan Energi)授予其“矿业工程大使”(Dharma Karya Pertambangan)的荣誉称号。2009年,哈迪荣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简称ANU)“荣誉博士”衔头。2010年,为表彰哈迪在推进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总统追授其普拉玛塔英雄勋章(Bintang Jasa Pratama)

澳大利亚政府高度赞赏哈迪在推动亚太经济合作方面所做的贡献。从2014年开始,澳大利亚奖学金项目中增加“哈迪·苏萨斯特洛奖”(Hadi Soesastro Prize),该奖项将提供给两位印尼大学生(一名男生一名女生)以完成他们的博士学位。由此,哈迪的名字以“哈迪·苏萨斯特洛奖”(Hadi Soesastro Prize)的形式永存于世。同时,自2014年起,由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印尼项目(ANU Indonesia Project)联合举办“哈迪·苏萨斯特洛政策论坛”(Hadi Soesastro Policy Forum),旨在传播和讨论印尼公共政策。

哈迪于2010年5月5日去世,离开了他的妻子燕蒂(Janti)和他的两个儿子,阿古斯德(Aguste)和阿爾伯(Albert)(关于阿古斯德(Auguste Soesastro),可在第三部分《中华时装设计师》中查阅。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